

近代史研究

1

1983



JIN DAI SHI YAN JIU

目 录

(总第15期)

学习郭老 刘大年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与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姜义华 (7)

汪寿华日记·求知录 (37)

附:汪寿华传略 黄美真 (62)

如何评价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 王桧林 郭大钧 (65)

再论南昌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 金再及 刘志强 (81)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对土地所有权的政策 郭德宏 (89)

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 沈予 (99)

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变化概况 王健英 (121)

军队中党的领导体制的演变 郭占波 (116)

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 丁名楠 (149)

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 章开沅 (163)

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熊月之 (194)

上海资本家在辛亥起义及胜利后的积极表现 丁日初 (219)

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 武曦 (243)

孙武发家及其政治上的堕落 阮知 (255)

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

一文的质疑 米庆余 (271)

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 (美) 刘广京 (289)

读史札记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徐震秋 (282)

秋瑾殉难日质疑 何平立 (313)

袁世凯做皇帝还是八十三天 郭天祥 (316)

· 史学动态 · 中国现代史学术会议讨论概况 吴明 (192)

1983年1月出版

学 习 郭 老

在中国史学会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
九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

刘 大 年

郭沫若同志是公认的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科学、文化战线上卓越的领导人。我们纪念他的诞辰九十周年，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由于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引导者，过去我们总是学习他。现在纪念他，表达我们的怀念和崇敬，最重要的也还是学习他。

郭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不断前进的一生。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古代史、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的知识，就像这个领域的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那末在今天，学习郭老，最主要的内容应当是哪些呢？我想举出两点，与各位一同研究讨论。

第一，我们要学习郭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满创造精神地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最先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有李大钊同志。他写的《史学要论》和其他论著，至今看来仍然是很珍贵的。那些论著主要是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门著作。郭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这种著作的第一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都属于同类著述，而且在科学性上后来居上。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郭老坚持和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决不止于写出了大家知道的一系列作品。他的历史、考古研究工作，是与致力于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的。1924年4月，他开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部书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名著。其中有些地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来意旨，郭老有所了解。但是他强调，翻译这部书，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换期。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他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

仰者。1925年，郭老决定过翻译《资本论》，因出版商不肯接受，未能实现。1927年冬天以后，以他为首的后期创造社，集中宣传、阐发马克思主义，掀起很大的回响。郭老叙述当时的情形说：“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的”。创造社贡献了光荣业绩的“朋友”，是指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生这些革命思想理论战线上披荆斩棘的老战士。他们在自己的刊物《文化批判》上发表的阐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鲁迅这样说过：“有一件事是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拯救我——还因为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鲁迅的评论，也可以看出创造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功绩。他所说的“科学的文艺论”，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著作。1928年，郭老又从头攻读《资本论》，有人反对说，“文学家何必搞这个”。他坚持钻研下去。不久以后，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国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产生过一些卓越的历史家。其中司马迁在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上是最有创造性的。在创造性这一点上，不妨把郭老同司马迁相比；或者说郭沫若是无产阶级的司马迁，社会主义的司马迁。当然类比总是容易引起争论的，不会什么都一样。且不说他们历史观点的差别如何，司马迁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大约只活了四十二岁，非自然地死去，郭老就享有遐龄。司马迁因为敢于直言，到三国时还受到统治者的切齿愤恨，郭老生荣死哀，众人景仰。郭老后半辈子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这有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一辈子不忽不怠，奋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给人民做了好事，同时也给自己建造了纪念碑。

第二，我们要学习郭老研究历史十分重视联系革命实际，合理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为

改造现实世界而存在的。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徒存躯壳。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怎样联系现实，恩格斯再三讲过：马克思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一是剩余价值学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阐发历史运动、前进的客观规律，是与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出现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现实内在地、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或者牵强附会把历史硬拉到现实生活中来，或者按照现实生活的某种剪影，倒转过去摹写历史，都只能极大地破坏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要坚决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郭老的一些主要著作，在联系实际方面是成功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深入农村，中国向何处去？一些知识分子急切寻求答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是一部纯学术的古代史研究著作，没有片言只字涉及现实。但著者明白地说过，他写这部著作、从事这方面研究，是为着寻求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回答现实斗争中人们的疑问。中国守旧势力总是用“国情不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是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革命春秋》，页311—312）。“考验”的结果，中国确凿无疑地存在过奴隶制时代。由此也就可以推及中国历史与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规律是共同的。它从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度而来，最后要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后面这种制度怎样具体实现，当时无法

预见，但是方向明确。研究的是古代史，却正是对中国往何处去的一个回答；而且这个答案又是同国内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正确主张相联系的。这部论著出来后，思想界一时为之风靡，原因就在这里。《甲申三百年祭》的情形也是这样。抗日战争后期，全国注意的中心问题，一是如何取得抗战胜利；二是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它运用阶级分析观点，论述明王朝所以灭亡，是由于它的反人民和极端腐朽的统治；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一举推翻了那个腐朽政权，但是胜利冲昏头脑，又使自己彻底失败了。作者研究的是三百年前中国封建时代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却成了现实生活一面晶亮的镜子。国民党报纸加以诋毁攻击，毛泽东同志把这部论著规定为整风文件。这最好不过地说明它与现实联系的广度。郭老早年驰名的诗篇《凤凰涅槃》，被认为是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世界、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宣告。这个看法，也可以用来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不过前者是表现为诗人的浪漫和灵感，后者是表现为历史家敏锐的科学预见、历史眼光。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从不同角度联系现实，与郭老差不多同时的一些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因此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也形成了共同的时代特色。

郭老发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著作，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中国跨进社会主义，一转眼已经三十年以上。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辉煌伟大，也有过相当的曲折。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当前时代的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胡耀邦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要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这些教育要联系当前实际。这无疑是非常及时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和世界近、现代的历史，直接间接地、科学合理地回答一些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带普遍性的问题。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需要。如果郭老和老一

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联系的实际，主要是争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联系的实际，就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应当立足于这个实际，满足它的需要，从而开创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有没有别的路子可以选择呢？回头走史科学代替历史学的老路，是在科学面前倒退，不会有什么作为。看不见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会把它变成僵死的、人们不需要的东西。中国古人也懂得“惟陈言之务去”，“六经责我开生面”。说这些话的人是很有抱负、有思想的。但是他们因为跳不出封建主义的圈子，无法客观地对待现实斗争，也就不能从本质上去陈言，开生面。马克思主义把人变聪明了。郭老的榜样是极富教育意义的。

当我们讲学习郭老，肯定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贡献的时候，并没有认为他的论著里绝无率尔随意的地方，或者每一项研究工作都达到了不再需要前进的顶点。科学上也不可能有那种顶点。中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任何人也难于说自己网罗无遗，毫厘无误，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对他提出的某些论点、事件、人物、资料等商榷、改正，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要仔细加以区别，何者为主流，哪是占首位的。只有这样，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接受郭老留下的丰富遗产。

郭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重点在古代史，但中国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历史，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没有出版过近代史研究的专门著作，叙述这段历史的有《少年时代》以下的四卷自传。它们情文并茂，声光灿然。因此人们说那是传记文学的杰作，其实不如说那是中国近代一段重要历史秉笔直书的实录。其中有风云激荡的伟大场面，有各样历史人物小说式的细节描写，有对个人、事件识见宏远的评论。某些关键的事变、事件，《革命春秋》、《洪波曲》上的记载是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一些叙述和评论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例如《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不但把反革命的政变内幕活灵活现地揭发、暴

露在世人面前，在讲到蒋介石政变的阶级基础的地方，使人不禁联想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关于拿破仑第三政变的社会基础的阶级分析。又如抗日战争一周年时，郭老在武汉发起爱国献金运动，他叙述那种“献金狂潮”的情形说：献金总人数，多至一百万以上。献金的什么人都有，擦皮鞋的小孩、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家庭女佣人、洗澡塘擦背工人、茶楼酒馆的堂倌等等，是主要人物，甚至于连叫花子也有。他们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二十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一百多万元的数目，主要是靠着这些贫穷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自然也有献金的，为数断不会有穷人多，所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贫苦群众。“总之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实在是远远超出乎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关于献金帐目的报告，出有专书。

“谁有这本书的，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散帐目而任意把它扔掉。我希望把它当成一部大有神圣意味的圣经贤传看待——不，这样还说得太过菲薄了。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洪波曲》页93—94）请看，这把广大劳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的感人肺腑的伟大精神，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真理，叙述得何等真切动人，何等形象而有说服力！郭老关于近代史的叙述议论，散见于各处，远不止自传上讲的那些。学术界正在大力整理研究郭老全部著作，将要拿出各自的成果。但对他那样浩繁的著述，作出系统的研究、科学评价，时间太仓卒了恐怕是办不到的。《郭沫若全集》不久将陆续出版。这是一个推动力。应设想，我们的研究者，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工作，到郭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出版一部或几部比较全面的、与郭老学术水平相称的专集、专著，那对于学习郭老，对于历史研究工作，都将是很好的贡献。我热烈地希望，那时候，我们能够这样来纪念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者、我国的这位文化伟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姜 义 华

近代中国，风起云涌激荡于思想界的启蒙运动，以其锐利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经学、世界观、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秩序，为行将到来的反对帝国主义及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伟大革命，启发和武装了人们的头脑。

同西方先辈们一样，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所从事的，是一场体现着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运动。然而，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也不同于十九世纪前期的德国和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西方启蒙学者们所热烈向往和讴歌过的理性、博爱、自由、平等，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不是秘密。仍然与广大民众同命运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们，不能不正视富有者与贫穷者对立空前尖锐化的严峻现实，也不能不关切地注意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历史前提的巨大差别，决定了中国启蒙思想家们一边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边又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因之便具有与西方启蒙运动非常不同的内容与形式；而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这场运动，几乎从它一开始，便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联系在一起。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介绍与传播，以及它在中国思想界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已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运动的每一步重大发展，

都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息息相关。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无疑将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特征，了解中国近代的觉醒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在联系，更为具体而全面地认识中国人民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

一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成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转折点。“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变化，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大批建立、成长和成熟的时期。根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可以看到，也正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始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零星的了解。

中国最先报导巴黎公社斗争的，是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华字日报》创办于一八六四年；《中外新报》创办于一八五八年。普法战争爆发后，刚从欧洲游历归来的王韬与张芝轩、何十洲及陈霭廷等，“午夜一灯，迅笔瞑写”，译撰了大批报导，交《华字日报》等报发表。一八七一年，王韬将这些报导汇集起来，补充以其他资料，编成《普法战纪》十四卷，刊刻发行，使读者面从香港、广州一隅扩大到了内地。今天，《华字日报》等搜寻不易，但我们从《普法战纪》这部著作中，可以考知当时人们是如何观察与理解巴黎无产阶级的壮烈斗争。

什么是公社？王韬写道：“先是法京各乡间，欲行保甲，例各自不相辖，赋税则由自征；徭役则由自供，兵勇则由自出，上之人一概毋得钤制之。”这就是绝对的地方自治，公社有权确定和分配捐税，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机关和武装力量。

公社的主体是谁？王韬写道：“其所谓乱党者，即京师内外之护勇与居民也。而其始发难端者，则民也。”当梯也尔卖国投敌、与普鲁士签订和约之时，“勉拿他〔今译梅诺蒂，即加里波第〕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各村乱民，无不斩木揭竿，蠢然竞起。弹指之间，其乱已成。”

巴黎公社是怎样建立的？三月十八日起义一成功，起义者便“传檄远近，示期于三月二十二日公举人员”。巴黎公社建立后，发布宣言：“兹已公立朝廷，名曰保民而卫国，凡属苍黎，时紫宵旰。此心所发，薄海咸知。”

反革命派是如何残暴地屠杀起义者的？“获即击杀，极形残酷。兵刃相接，杀人如麻。积骨成丘陵，流血成沟洫。”“擒得乱党，概治以军律，用枪击杀。每次以五十人或一百人为一队，火枪所拟，溃肠洞腹，碎首裂脑，诛戮亦惨矣。”

巴黎人民以怎样的英雄气概对待反革命的屠杀？他们殊死作战。尤其是巴黎的妇女们，无论在街垒里和在刑场上，都视死如归。“其临阵从容，决机猛捷，皆刚健中含婀娜之气，非及笄之姝，即待字之女，力强而气锐，其鸣枪发炮，娴熟而敏速，虽久历疆场之士，无此精练。”

究竟怎样评价这场斗争？王韬写道：“推其致乱之由，则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法国廷臣之转为自主之国也，民间嚣然，皆以为自此可得自由，不复归统辖，受征徭，从役使，画疆自理，各无相制。爹亚〔今译梯也尔〕以为不可，于是銜之切齿，揭竿竞起。明知势不能敌，法京断不可守，但愿与城偕亡。”

尽管《普法战纪》的编撰者视巴黎无产者为乱民、乱党，赞成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表现了明显的阶级偏见，然而，这些记述，终究将世界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斗争的一些重要特征，以较为原始的形式及时地介绍到中国来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统治阶级都加紧了对无产阶级的进攻。然而，结局与他们的愿望相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从欧洲、南北美洲扩大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在许多国家都奠定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则走在这些政党的最前列；俄国、西班牙和其他许多国家年轻的工人阶级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国际政治发展中的这些重要动向，在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中国报刊书籍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反映。

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事汇编》，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二年初，逐周汇述各国重要时事，不定期出版，是当时中国人藉以了解世界现势的一个重要窗口。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八七三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谢菲尔德机械工人大罢工和一八七四年英国造船工人和煤铁矿工大罢工的情况，可以看到英国议会由于工人组织的强烈要求而通过九小时工作制及限制童工、女工工作时间立法的情况。^① 从中，人们还可接触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消息。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德国举行帝国议会改选，社会民主党人在八个选区中当选为议员，《汇编》立即作了报导，称他们为“主欧罗巴大同之议者”^②。一八七八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藉德皇威廉一世遭刺事件，强行通过“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迫害社会民主党人。《汇编》对此也多次作了报导，叙述了议会多次辩论，致使俾斯麦“严治乱党章程”迟迟未获通过的情况，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或为“康密尼人”，或为“乱党”，或为“民党”，还介绍“德人茂林〔今译梅林〕著一书，名《日耳曼民党通议》，其党目有一百五十人。此外有数新报馆，亦其党羽。有成册者，名《新世界录》〔今译《新世界》〕，购观者甚众，每售三万五千本”。^③ 后来，大批社会民主党人遭到放逐，《汇编》也作了报导：

“德国民党为国家逐出柏林者一百五十五人，汉倍克〔汉堡〕者一百五十五人，拉拔雪茄〔莱比锡〕者七十人，共四百二十人，皆有家属妻子赖以养贍，自被逐后，分往英、美。”^④ 《汇编》还以相当篇幅报导了西班牙、美国和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比如，一八七三年便连续报导了西班牙起义的状况，逐城报导了亚尔科等城市各工会要求“藉境内富室积产，按名公晰，以贍贫困，其工值所得亦公晰，以均有无”的消息^⑤；一八七五年报导了俄国政府惊呼必须防止“创为贫富均财之说”的消息^⑥；一八七八

① 见《西国近事汇编》同治癸酉年卷一、二、三，同治甲戌年卷一。

② 《西国近事汇编》同治甲戌年卷一。

③ 《西国近事汇编》光绪戊寅年卷二

④ 上书，光绪辛巳年卷四。

⑤ 上书，同治癸酉年卷一、卷二、卷三。

⑥ 上书，光绪元年卷二。

年报导了美国“康密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并“演练为兵”，图谋起义，“以偿其贫富适均之愿”的消息^①。康密尼党，即共产主义党人的音译，而“贫富适均”等等，则正是这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始译述。其时，中国驻德使臣李凤苞在他的《使德日记》中也曾用这些名词，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比如，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五日日记就写道：“先是欧洲有‘莎舍尔德玛噶里会’，译言‘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一八七九年一月二日日记又写道：“德国……之‘平会’，西语‘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瑞士为民政国，故混迹尤多。在俄者曰‘尼赫力士’，在法者曰‘廓密尼士’。今各国禁逐。……又闻柏林有平会五万八千人，且有充议员者，德君不能禁也。”这里的“莎舍尔德玛噶里”，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音译；尼赫力士，就是民意党的音译；而廓密尼士，则与康密尼同，都是共产主义的音译。应当说，正是这样一些报导与记述，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人们对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况有了最初的了解。

《西国近事汇编》之后，给人们提供了西方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较多消息的，是《万国公报》。从九十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们为向渴求变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兜售西方的宗教救世说教，开始在这个刊物上有意识地译介一些当时流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并极力使之皈依于基督教救世教义。比如，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九二年四月《万国公报》第三十五册至第三十九册，便连载了贝拉米著、析津译的《回头看纪略》（原名《回顾2000—1887年》），描绘了公元二〇〇〇年时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占有一切生产机构与分配机构，在高效率的机器大生产基础上，实现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完全平等。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万国公报》第七十一册到一八九九年五月《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四册，英国教士马林先后发表了《以地租征税论》、《再论以地征租之利》、《富民策》、《各国富

^① 《西国近事汇编》，光绪三年卷二。

国策辨》、《地工本之说》等文，系统介绍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及单一税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九九年二月至五月，《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一册至第一百二十四册连载的《大同学》，承认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并未带来普遍的幸福，“分利之人日益富，生利之人日益贫”，结果，工人们便“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此文在阐述这一趋势时，曾直接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穷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① 文章中还写道：“今世之事，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恩〔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美国之爵而治〔即亨利·乔治〕，主于救贫者也；美洲又有拍辣弥〔即贝拉米〕，主于均富者也；英国之法便〔即费边〕，尤以能文著。皆言：人隶律法之下，虽皆平等，人得操举官之权，亦皆平等，独至贫富之相去，竟若天渊。语语翔实，讲求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②《大同学》系据英国企德〔今译颀德〕《社会进化》一书节译。《社会进化》一书出版于一八九四年，作者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这部著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生物进化学说与非理性主义的宗教结合起来，书中引述马克思的话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言论，最后还是为了论证：要消除社会的分裂状态，必须求助于超理性的宗教力量。但是，尽管如此，《万国公报》上所刊登的这些文章，毕竟使它的读者对西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有了较多的接触，并首次知道了马克思。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运动日渐高涨，大批宣传变法的报刊问世。在这些出版物中，报导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党活动，介绍

① 李提摩太节言、蔡尔康撰文：《大同学》，《万国公报》第一二一卷。

② 李提摩太节言、蔡尔康撰文：《大同学》，《万国公报》第一二三卷。

所谓“均富”、“无君”思想的文章，也日渐增多^①。还有一些著作，给中国介绍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专门评介废除私有财产的各种主张。^②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尽管还是零星的、初步的，而且往往是扭曲了的，是许多错误的东西混在一起的，它还是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使许多向往西方的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开始持保留态度；它最为显著的结果，就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酝酿与初步形成。

康有为在回溯自己思想发展与转变的历程时说过，他就是在 一八七九年得到《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及其他几种西学书籍，并游览了香港后，“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由此而“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这里，他所列举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西国近事汇编》。一八八四年，康有为“始演大同之义”；一八八五年，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一八八六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③今天，《人类公理》手稿已不复可见，《公理书》在九十年代初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抄件仍存。这份手稿包括凡例、实字解、公字解、总论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论人公法、整齐地球书籍目录公论等十六部分。康有为指出：“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于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据此，康有为宣布“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等为“实

① 比如，《时务报》第六册便刊登了《社会党开万国大会》的消息，报导了一八八六年第二国际伦敦大会的情况。该报第四十七册《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便专门评述了举世闻名的一八九七年伦敦机械工人大罢工事件。

② 比如，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法思德著、汪凤藻译《富国策》等，便都有专章讨论这些问题。

③ 以上俱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理”，他所宣布的“公法”有“人有自主之权”、“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圣不秉权，权归于众”等等。中外各种现实的制度，都被他宣布为“不合几何公理”、“与几何公理全背”，例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君民共主”、“君主威权无限”、“圣权无限，凡奉此圣之教者，惟以此圣为主，不以理为衡”等，便都如此。^①康有为思想发展的这一过程，以及《实理公法全书》中的这些观点，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将他的思想演变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这两者的内在联系。象康有为一类知识分子，这时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接受这一无产阶级的崭新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但是，这却并不阻止他们试图从与西方启蒙学者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解决自己时代所提出的各种课题。中国启蒙运动在其初期阶段，便产生了《人类公理》、《实理公法全书》这样一些闪着特异光彩的著作，其思想基础当即在这里。

二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获得较多的了解，是在二十世纪最初那几年。一方面，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迭遭失败，人们焦虑彷徨，如饥似渴地急于找到救国救民的新路；另一方面，随着留学运动急速展开，大批青年学子来到日本，与正在勃兴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有了直接接触，读到了前此在国内根本接触不到的一大批社会主义著作。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刺激下，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四年间，一度形成了将日本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译介到中国来的热潮。

这期间，也有一些人在欧、美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比如孙中山，早在一八九七年在伦敦时，就可能“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它人”。^②他曾自称此时“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族极乐之乡也。是

^①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抄件。

^②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一一九页。

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①。但即使是他，事实上也是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三年旅居日本期间，方才与社会主义思潮有了较多接触。

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四年至少出版了以下八种译自日文的评介社会主义的专著。

一、《广长舌》。作者：幸德秋水。译者：中国国民丛书社。商务印书馆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

这是一部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商务印书馆此书的广告说：“欲知吾人今日世界之主眼，不可不读是书；欲探世界将来之影响，不可不读是书”^②。

二、《社会主义》。作者：村上知至。最初由支那翻译会社编辑发行的《翻译世界》译成中文，刊登于一九〇二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三年一月出版的《翻译世界》第一至第三期。作者误为“村上知玄”。另有侯士绶译本，一九〇三年六月由文明书局出版。同年广智书局还出版了罗大维的译本。

村上知至是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这是他系统阐明自己社会主义观点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这部著作宣称：“古代之基督教，代表近时之社会主义”，“近时之社会主义，阐发古代之基督教”。第十章《理想之社会》甚至论证“今则工业之时代将去，而道德之时代将来”。

三、《近世社会主义》。作者：福井准造。译者：赵必振。广智书局一九〇三年二月出版。

这部书分四编：第一编题为《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了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蒲鲁东、路易·勃朗的生平、著作和学说；第二编题为《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第一国际的历史、洛贝尔图斯与拉萨尔的生平和学说；第三编题为《近时之社会主义》，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① 《孙文学说》第九二页。

② 《外交报》壬寅第二十六号插图